

# 长城非“中国古代中原政权边界”论 ——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王绍东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 要:**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 而不是古代中国中原政权的边界线。从“夏”“夷”观念上看,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外国”; 从长城形成的历史看, 长城从来没有被当做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界线; 古代中原政权也从来没有以长城划定自己的活动区限。

**关键词:** 战国; 秦汉; 长城; 国界线; 游牧民族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2014)01-0103-04

在对长城的认识上, 曾经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 日本的田村实造等借助美国学者魏特夫提出的“征服王朝论”的理论, 提出了所谓“北亚历史世界”论。这一理论从地理因素出发, 把中国历史分为“北亚历史世界”(中国长城以北地区)和“东亚历史世界”(中国长城以南地区), 人为地把长城以北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来, 从而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开脱<sup>[1]624, 648</sup>。前苏联的一些学者也曾经抛出“长城以北非中国论”, 鼓吹长城是中国的边界线, 从而给历史上沙皇政权割占大片中国领土寻找依据。对于这种观点, 研究长城的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反对和批判。但就我的视野所及, 这些批判和剖析在系统性与深刻性上尚显薄弱, 本人试图以战国秦汉时期长城的修筑为视角, 对此问题加以剖析。

## 一、从“夏”“夷”观念上看, 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从未被认定为“外国”

提出“长城为中国古代中原政权边界线”观点的人, 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深刻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长城的历史, 另一个方面则是别有用心, 给帝

国主义者企图把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从中国领土中分离出去制造舆论。

在中国历史上的先秦秦汉时期, 虽然国家机制的建立已经相当完备, 文明发展的程度也达到了较高水平, 但却没有现代的国家边界意识。当时用于对不同地区、不同文明发展阶段民族的区分方式是“夏夷之别”。“夏”和“夷”的区分, 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区分, 而通常的标准是从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生产力的发达与否、居住区域是中原还是周边地区、采用的生产方式是农耕还是游牧等。自公元前 21 世纪至公元前 8 世纪的 1300 年间, 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 先后出现由不同民族汇合而成的夏、商、周三个王朝, 他们以华夏自居, 将其其他少数民族视为“夷狄”, 但却没有将他们看成是外国, 而仅仅将他们看成是在文化发展上比自己落后的民族。对于夷狄, 三代的统治者认为应该通过武力征服与文化浸润等手段, 使他们逐渐融入华夏族之中, 也就是所说的“用夏变夷”<sup>[2]《滕文公章句上》</sup>。

春秋战国时期, 伴随着各诸侯国实力的扩张, 华夏族不仅占据了农业生产条件优良的中原地区, 而且逐渐渗透到周边地区, 与周边民族的冲突也更加

收稿日期: 2013-04-16

基金项目: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S020)“多维视角下的内蒙古地区战国秦汉长城研究”; 内蒙古社科联 2013 年度科研课题(201335)

作者简介: 王绍东(1964—), 男, 内蒙古宁城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秦汉史。

剧烈,“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之不绝如线”<sup>[3]</sup>卷10《僖公四年》。春秋时期的两个霸主齐桓公、晋文公都曾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帜,得到了各诸侯国的拥护,成就了霸业。战国时期,在兼并战争中,各个国家在自己的领地内纷纷开展民族兼并活动。“由于民族整合,文化交融的加强,自春秋以来的华夷界线进一步被打破,我国出现了‘华夷一统’的趋势。”<sup>[4]</sup>在孟子看来,民族不完全是种族的不同和地区的区分,可以以文化而变化,舜出生时是东夷人,周文王出生时是西夷人,后来都成为了华夏族的圣人。“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sup>[2]</sup>《离娄章句下》

秦汉时期,中原建立了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国家。在秦汉的统治者看来,中国即天下,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下共主,在秦汉王朝之外,没有另外的国家,只有化外之民。根据《史记》的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sup>[5]</sup>卷110《匈奴列传》匈奴与华夏族有共同的祖先,是与华夏族同源的人群。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与中原地区差异巨大。秦汉王朝对他们进行军事打击,在不足以使他们臣服的情况下,修筑长城加以隔离,是为了更好地占据中原地区的优势农业资源,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sup>[3]</sup>卷18《成公十五年》。当中原政权的力量足够强大时,就通过军事征服的手段使其臣服,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主,百王不易之道也。”<sup>[6]</sup>卷99《王莽传》对被看做夷狄的各少数民族,不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最终目的是使他们被中原政权所控制。“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于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冑之士则言征伐。”<sup>[6]</sup>卷94下《匈奴传》通过征伐、封赐、进贡、贸易、岁币、和亲等多种手段,实施对包括匈奴在内的“夷狄”以羁縻政策,使他们成为中华大家庭的一员。可以说,从“华夷一统”,“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sup>[6]</sup>卷4《儒效篇》的角度,长城以北的各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外国”,长城也就不具备古代中原王朝国境线的意义了。

## 二、从长城形成的历史看,它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界线

学术界一般认为,长城起源于战国时期。战国

时期,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已经丧失。经过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春秋初期100多个小的诸侯国被吞并,形成了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个强大的诸侯国。战国七雄纵横捭阖,战争连绵。各国都拼命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发的扩大,国与国之间的“隙地”(无人区)越来越少,相互之间对边界地区的争夺也越来越激烈。为了争霸图存的需要,在相邻的边境,各诸侯国纷纷修筑长城以巩固新夺取的土地,也防御强邻的进攻。当时齐国、楚国、魏国、赵国、燕国、秦国等都修筑了彼此防御的长城。对于战国七雄来说,尽管他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疆域与控制范围,但没有一个国家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就是“中国”,自己国家的边界就是“中国”的边界。他们承认自己仅仅是一个诸侯国。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君主特别是广大人民对“无天子”的现象并不赞同,认为这是造成世道混乱、战争连绵的主要原因。《吕氏春秋·观世》篇云:“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划,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以兵戎和欺诈相待,稍有不慎,就可能兵挫地削,甚至身死国亡。所以,弱者求强图存,强者兼并称霸。各个国家追求的共同目标都是希望一统天下,使自己成为新的天下共主。战国时期,要求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渐成大势所趋。《吕氏春秋·执一》篇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持之也。一则治,两则乱。”统一成为了社会思潮,人心所向。这个时候各个诸侯国修筑的长城,只是救亡图强的工具,而不是什么中国的国境线。

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修筑的北方长城,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各国向北方游牧地区的开拓成果,防御游牧民族的骑兵南下<sup>[7]</sup>,把农耕区与游牧区相隔离,更好地保护农耕文明,自然修筑北方长城的各国也没有将其视为本国的北方边界。

秦朝统一后,为了巩固统一的需要,把各诸侯国之间修建的内长城加以拆毁,同时连接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的北方长城,筑起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防线<sup>[7]</sup>。但秦朝并没有把北方长城作为自己的国境线,秦始皇派蒙恬北击匈奴,占据了匈奴的“河南地”,并越过了秦昭王时期所修筑的北方长城,沿黄河流域、阴山山脉修筑了新的长城防线。对秦朝的统治者来说,新的长城也不能限制秦朝的扩张。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必要,只要能力所及,就可以把自

己的势力扩张到任何地方。之所以北击匈奴，筑长城以阻止匈奴南下，并不是承认匈奴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威胁秦朝安全、有待秦朝征服或同化的民族。秦始皇的疆土观念，可以从他巡游琅邪的刻石中反映出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普天之下，专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只要是视野所及、人迹所至之处，都被看做是秦朝的领地，只要是所知的人类，都是秦始皇帝的臣民。在秦始皇的脑海里，自己的疆域绝对不会被长城所限制。

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理念，在汉朝统治者的头脑中，“匈奴、西南夷、西域各族、朝鲜、南越以及散布于长江以南的以各种名号存在的蛮族，都属于大汉皇朝的子民。在汉朝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他们不理睬其他民族的存在，任其自生自灭。在其力量达到的地方，他们就要求所有民族以及他们建立的政权，都必须归属到他们的名下。”<sup>[8]</sup>当匈奴力量强大，汉朝需要休养生息时，刘敬提出对匈奴应实行和亲策略，但他的最终目标却是“兵可无战以渐臣也”<sup>[6]</sup>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也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的渗透，达到逐渐使匈奴臣服的目标。汉文帝时曾经给匈奴单于写信，强调：“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君臣相安，俱无暴逆。”<sup>[6]</sup>卷110《匈奴列传》这里的分长城而制，只是为了维护和平安定的社会局面，为汉朝创造休养生息的条件。就在汉文帝时期，贾谊在《新书·匈奴》中提出了对付匈奴的“三表五饵”之策，“‘三表’为‘信、爱、好’，即要得到匈奴人的信任、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五饵’为‘盛服车乘、盛食珍味、音乐妇人、高堂邃宇、召幸娱乐’，通过‘五饵’达到‘牵其心、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引其心’的目的，最终使匈奴单于‘无臣之使，无民可守’。贾谊希望通过‘与单于争其民’，使匈奴之民变为大汉之民。”<sup>[9]</sup>21-22 汉文帝本人一方面对匈奴强调分长城而治，另一方面则选拔有才干者担任边郡太守和军事将领，在边郡积贮粮食，驯养战马，扩充骑兵，目的就是蓄积力量，俟机越过长城防线，对匈奴进行打击。可见，西汉时期，在汉匈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尽管双方有划长城而治的约定，但汉朝也没有把长城当做国境线。

汉武帝的统治目标则是中国一统，周边各少数民族都来朝贡臣服。这一思想体现在《泰山刻石文》

中：“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荒，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sup>[10]</sup>卷5《泰山刻石文》太初四年，汉武帝从大宛得到天马，为此，他特意创作了《西极天马之歌》，把天马来临作为四夷臣服的标志。“天马来兮从四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sup>[5]</sup>卷24《乐书》汉武帝处理民族关系的理想蓝图就是天下一统，四方来朝，使周边少数民族都心悦诚服地认同大汉王朝的统治地位。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汉武帝改变对匈奴的策略，变和亲为战争，目的就是征服或者臣服匈奴。通过多次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先后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河西地区和大漠以南的北方地区，并在这些地方修筑长城。汉武帝时期修筑的北方长城是西汉王朝极力开拓扩张的产物，但汉武帝并没有把长城当做西汉王朝的北部边界，而只是把它们作为巩固新征服土地的屏障，同时，也作为继续向外开拓疆土的跳板。

从长城早期的发展历史看，无论是战国时期的内长城还是北方长城，以及秦汉时期的北方长城，都没有作为中原王朝的北方边界线进行建设和加以使用。

### 三、古代中原政权从来没有以长城划定活动区限

战国时期，长城作为各诸侯国彼此设防的工事，并没有成为修筑国的国境线。以秦国为例，战国初期，相对于强大的魏国，秦国的力量弱小。秦厉公十六年，“堑河旁”<sup>[5]</sup>卷5《秦本纪》，秦灵公八年，“城堑河濒”<sup>[5]</sup>卷15《流过年表》，秦简公八年，“堑洛”<sup>[5]</sup>卷5《秦本纪》。史念海先生在《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址的探索》中认为：“堑洛的堑是掘的意思，这里所谓的堑洛，是削掘洛河岸边的山崖。这是修长城的一种方法。”彭曦先生赞同这样的观点：“考察结果也使我更认识到秦国早期沿河、洛所在的堑，都是以堑削自然河岸的地形为主要施工手段，在不能施堑的地方，也有夯筑、石砌等技术施工的大量遗迹。这种堑技，不仅是筑城，即使是烽燧和鄣塞也用此法。”<sup>[11]</sup>秦国这时的长城，是沿着黄河和洛河修筑的，就是为了防御魏国对秦国的进攻和蚕食。魏文侯时任用李悝实施变法改革，最早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魏国利用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渡过黄河进攻秦国，夺取了大片黄河以西的秦国土地，并任命著名的军事家吴起为西河郡郡守，对秦国保持着强大的攻势。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的秦国被迫在黄河以西的北洛河沿线

修筑长城,以阻止魏国的西进。

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摆脱了落后挨打地位,走上了逐渐富强的道路。秦孝公时期,随着秦国实力的增强,在与魏国的交战中连续打败魏军,迫使魏国交出部分河西之地给秦国。很快,秦国越过了原来防御魏国的堑洛长城,而原来采取攻势的魏国则被迫在黄河以南修筑长城,以防御秦国的进攻。这时,秦国早期修筑的洛河长城已经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自然被秦国所废弃。此时,黄河洛河沿线的天险不再作为秦国的防御屏障,而是作为秦国进一步向东、向南进攻的前沿阵地了。

秦昭王时期,在向东与向南的方向对六国的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处于进攻方的秦国也没有在东南方向修筑长城的必要。而在西北方向,攻占了戎狄的大片土地后,则面临着游牧民族的骑兵侵袭。为了集中精力对六国用兵,并有效抵挡游牧民族机动灵活、来去迅急的骑兵,秦昭王修筑了北方长城。但秦国并没有局限在这段长城以内活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越过昭王长城,夺取了匈奴的“河南地”,并把长城进一步推进到阴山山脉。从秦国修筑利用长城的历史来看,他们从来没有用长城来限制住自己的活动范围,而且根据形势需要而修筑长城防御,一旦力量增强后,就马上突破长城的防线,继续向外开拓。

西汉前期,由于匈奴的力量强大,汉朝政权一方面与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利用长城实施防御。汉武

帝时期,随着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与对匈奴策略的变化,汉武帝不断派军队越过长城防线对匈奴发起进攻。在占据了匈奴的战略要地后,又修筑新的长城加以保护。从汉武帝四夷归服的理想来看,新修的长城没有被西汉政权视为自己的疆域,而只是作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跳板。因此,从长城产生到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政权从来没有把长城当成是自己的国界,也从来没有用长城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 参考文献

- [1] [日]田村实造. 中国の征服王朝について[C]//中国の征服王朝研究. 京都:日本东洋史研究会,1971.
- [2] 孟子注疏[M]//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十一. 标点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春秋公羊传注疏[M]//李学勤. 十三经注疏:八. 标点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4] 曾文芳. 战国民族思想与民族统一[J]. 管子学刊,2008(1).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 [6]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 王希伟. 甘肃早期长城所见关堡略论[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2(2).
- [8] 孟祥才. 先秦两汉时期的“夏”“夷”观念[J]. 南都学刊,2010(2).
- [9] 丛晓明. 前后纳贡时期汉匈经济交往[D].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09.
- [10] 严可均,辑. 全汉文[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1] 彭曦. 春秋有长城吗[J]. 陇东学院学报,2003(1).

## The Theory of the Great Wall is not “Ancient Chinese Zhong-yuan Regime Bound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riod of Qin-Han Dynasty in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WANG Shao-d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70,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Wall is the spiritual symbol of China, but not Zhong-yuan regime boundary. From the view of “Xia” and “Yi”, China northern minorities has never been regarded as “foreign”; from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Great Wall’s building, the Great Wall has never been recognized as ancient Chinese boundary; and ancient Chinese Zhong-yuan regime has never been restricted itself inside the area behind the Great Wall.

**Keywords:** the warring states time; Qin and Han Dynasty; the Great Wall; boundary; nomadic nations

(责任编辑:客西)